

新论新点

以民法原则匡扶良俗

■杨永纯

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,把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。根据这一原则,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,必须遵循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。这一规定补充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,尤其是针对一些不良风俗现象,能起到矫正和引领的作用。

“乐以移风易俗,礼以安上化人。”礼俗的传承在于倡导善良风俗、教化濡养后人、维护社会公序。然而近年来,失序礼俗困扰着部分群众生活,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普遍现象,也因此被舆论集中关注。避免礼俗伦理异化、维护和规范社会公序良俗,不仅是人们的共同期

待,也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目标。

我国民法既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,也强调一切民事活动均应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。有两个原则的配套适用,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。礼俗习惯是社会理性的一面镜子,近年来,种种因彩礼引起的婚姻矛盾、家庭返贫、司法纠纷不时出现。除彩礼外,婚丧仪仗、高考升学、大宗家用器具特别是车辆购买、甚至以家畜繁殖等名义追索礼金等现象,也屡见不鲜。凡此种种,都形成与公序良俗冲突的事实行为,是对传统的背离。对失序礼俗的治理,考验着社会对公序良俗的恪守限度和理解水平。

在当前精准扶贫的大局下,如果任由失序礼俗蔓延,其导致的返贫问题将严重妨害政策实施效能。礼俗的异化不仅可能导致家庭矛盾,还可能恶化社会风气、转移经济负担、浪费司法资源等。对这种民意焦虑,亟待法律规制。《民法总则》第十条规定,“处理民事纠纷,应当依照法律;法律没有规定的,可以适用习惯,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”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,“禁止包办、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。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。”所以,基层政权机关和农村自治组织要摒弃礼俗习惯“两厢情愿、愿打愿挨”的观念,掌握依法治理的主动

权,同时适格运用政策允许的手段,引导礼俗传统的健康存续。

引导善良风俗的形成,也要善用党内法规。失序礼俗因妨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有充足的制约和改进依据。礼俗失序对当前农村的婚丧观、奋斗观、幸福观形成不良诱导,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。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规定,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要“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,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”,也要“开展创建文明村镇、文明户活动,破除封建迷信,移风易俗,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”。因此,党的基层

组织可以理直气壮地运用法治思维,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礼俗新风尚。

以良善风俗积淀而成的社会秩序、公共美德,凝聚着一个民族对精神文明的理解和接受水平,事关本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。针对失序礼俗制定规则,依法治理,将更好让民众知悉民事礼俗的行为边界,守护传统,有所遵循。民法总则出台后,人民法院也可以在涉及类同事实的司法纠纷中,灵活运用公序良俗原则,认定借失序礼俗过度逐利行为无效,从而在协调复杂利益冲突、维护社会正义的同时,恰当引导社会利益与公共道德秩序正确归位。

观点

整肃旅游不能单纯“谈业务”

■张帆

旅游市场的整治,也需落实党政同责,管住乱伸手的权力,动动某些人的奶酪,从而带动行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好转

3月27日,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对社会公布,内容涉及购物市场、旅行社、导游、景区景点、行业协会、监管、政府责任等7方面22条新规。云南省领导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承诺的“云南史上最严治理措施”,能否尽快有效遏制云南旅游乱象,再次引发高度关注。

近年来,因低价游和强迫购物所引发的负面事件,不仅让“彩云之南,旅游天堂”的美誉多次蒙尘,甚至对云南开放、和谐、安宁的整体形象造成直接伤害。虽然陆续采取了一些整治措施,但大多停留在治标阶段,未能触及旅游市场的深层次问题。据人民网公布的数据,截至2017年2月,涉及云南的旅游投诉占全国总量的34.8%,仍居全国第一。

治乱首先要找准致乱的根源。“不合理低价游,高额购物回扣”的顽疾经常在整治之后又出现反弹,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斩断灰色利益链条,以至于破除旅游市场潜规则,需要省领导发狠话,责问某些嚣张的购物店背后是否“有人”,直接要求工商、公安甚至纪检部门去查查。这清楚表明,市场乱象背后,有权力之手在寻租牟利;而在诸多旅游纠纷中,也不难看到权力不作为、懒作为、乱作为的影子,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由此被扭曲,市场秩序失范。

因此,就不能将旅游市场的整治视为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,而要从落实党政同责,各部门齐抓共管,严肃党纪政纪,强化问责做起。从云南此次公布的整治措施来看,除“取消旅游定点购物”“禁止不合理低价游”“建立旅行社黑名单制度”等外,特别强调建立旅游监管履职纪检监察机制,强化属地监管责任,明确州、市主要领导为旅游市场监管第一责任人,并明显加大了监督考核问责力度。这体现了管住乱伸手的权力,真正动某些人的奶酪,从而带动行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工作取向。

治理旅游乱象,还要与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同步。应该说,观光旅游在云南起步早,经过20多年的发展,2016年全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4.31亿人次。但与此同时,旅游业的体制、机制却日益陷入游客和门票收入增长的路径依赖中,难以适应旅游需求向高端化、个性化、多元化的转变,急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破除利益藩篱,释放创新动力,早日形成新型旅游业态,才能使云南旅游逐步从低恶性竞争、靠购物高回扣维持的经营模式中走出来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如果这22条新规范真正落到实处,云南旅游市场有望逐步回归理性,趋淡旅游的报价将会提高,短期内团队游客人数可能下滑;同时,新旧经营模式转换,利益分配不断调整,旅游行业将迎来一段阵痛期,部分企业将被淘汰出局,部分不适应的旅游从业人员也将面临重新就业,这是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付出的代价,业内外对此已有共识。政府和社会在以积极心态迎接新变化的同时,需要主动及时化解转型的矛盾和问题,努力将阵痛降到最低程度。

在3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,云南有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承诺,确保在一年内旅游市场秩序根本好转。决心如果能够化为转变,必将产生辐射效应。云南面临的问题,相关各省区市也多少存在。云南不应成为整治的孤岛,各地方也不应等着旅游热起来、问题蹙起之后才行动。全面小康,不能落下旅游质量和群众体验的提升,真心希望全国旅游市场上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越来越少。

根治恶炒学区房现象还有多远?

■于子茹

为了抑制恶炒学区房的乱象,继北京市委宣布“过道学区房”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后,北京市委近日会同规划国土委颁布新政,严控住宅平房区自建房分割为多间的行为,并明令规定平房的“过道”在不动产登记中标注。

什么是“过道学区房”?为什么它要被整治?据媒体报道,所谓“过道学区房”,是指不具备居住条件却有房产证的过道“零居”。因为卖家说能落户,可以就近上学,于是成了中介力推的“学区房”。甚至,一些平房的厕所也成为落户单位,以“学区房”名义进行买卖交易。这类奇葩“学区房”,折射出学区房非理性交易的乱象。

整治这类乱象的消息一出,有些家长拍手赞成,而有些家长黯然神伤,毕竟曾经买个“过道”就能让孩子有个好学校去读。如今政策一出,变相堵住了他们的一丝希望。同时,也有业内人士指出,此次出台的新规对热门学区的影响或很小,多校划片入学并不能缓解家长的择校焦虑。毕竟“过道学区房”十分特殊,也属个例,怎样治理整体学区房才是关键。

时下,房子并非用来单纯“居住”,其上绑缚着更多附加功能,学区便是其中之一。尽管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在不断扩大,但择校热却愈演愈烈。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以至于一些父母为了买一间无法居住的过道而豪掷成百上千万元。

从去年至今,南京、成都等多个城市为抑制学区房升温出台了政策。即便如此,不少地方的学区房价格依然上扬。为何出现这种现象,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。

以北京地区为例。早在多年前,海淀房价神话就被国人吐槽,时至今日,在名校扎堆的海淀,仍远高于北京四、五、六环其他区域。高昂的价格门槛,让优质教育资源明码标价,成为了普通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,与教育公平的理念背道而驰,自然也属于房价调控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。

然而,一纸限制令,无法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。在这场教育资源竞价拍卖的角逐中,只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获得教育资源,方可终结学区房神话,让房子不再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筹码,进一步回归住所的本质。

思想引领

守望文明是所有人的事

■张贺

日前,山西省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“文明守望工程”实施方案,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、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、认领认养等方式,参与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,引发舆论高度关注。

有些人担心此举会影响文物安全,甚至会让部分文物古迹从此变成私人会所。这种看法充满忧患意识,却忽略了当前文物保护的主要矛盾。

目前一个急迫的问题是,仍有数量庞大的文物,保护力度远远不够。我国仅不可移动文物就有近77万处,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12万多处。许多级别较低的文物保护单位缺钱缺人,许多野外文物

社会力量动员越充分,文化守望者就越多,也就越能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水位

处于无人管、无设备、无管理的“自然”状态。据报道,山西有的县文保资金是“零”,不少古寺庙长期荒废,屋顶长满野草,室内遍地羊粪。无人看守,等于给了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就在实施方案公布前不久,山西破获一起古庙壁画失窃案,抓获一个长期在山西省内流窜作案的12人文物盗窃团伙,追回数百幅古壁画。据公安部门统计,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接到各类涉文物犯罪案件2400多起,呈上升趋势。

国内外经验都证明,单靠政府一己之力,是不可能全面保障文物安全的。与其让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在风吹日晒中衰败,在文物贩子

手中流失,不如想办法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,让那些政府难以顾及的文物也能得到妥善保护。事实上,保护文物从来都不只是政府的责任,更是所有公民的责任。包括文物在内的文化遗产,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,每一处文物古迹的损毁、消失,就意味着我们一部分权利的丧失。因此,守护文化遗产,没人可以置身事外。

当前,全社会文物保护和文化权利意识还不够强,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缺少参与机会。只要敞开渠道,让文物更多融入日常生活,群众对文物有感情,就会产生主动保护的意愿。2004年,国保单位贵州黎

平县地坪乡风雨桥被暴雨山洪冲毁,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全部建筑材料捞回来,为复原风雨桥作出重要贡献。为什么地坪乡群众会有这么高的觉悟?因为风雨桥是他们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一道风景,失去它会有切肤之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只要管理得当,认养不仅能解决文物失管问题,还可以在人们心里筑起一道情感保护墙。

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,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。美国就将国家公园的经营权分成旅游、住宿、餐饮、旅游纪念品等特许经营,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对中标者进行监督。中标者获利了,政府也有钱用于自

民生点评

北京医改究竟带来哪些改变?

■于茹

北京医改方案于22日正式发布。根据方案,北京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于4月8日起全面取消药品加成,统一实施药品阳光采购,设立医事服务费。有报道称,北京医改迈出关键一步。这也意味着在北京看病即将开启“医药分开”的时代。

长期以来,以药补医机制是公立医疗机构重要的补偿渠道和收入来源。以药补医机制虽然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,但弊端越来越明显。自2009年,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,“看病难”“看病贵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,但“以药养医”助推了人民群众看病成本。群众普遍反映部分医院小病大治、过度医疗。要使医改成果得到不断强化和巩固,必须坚决取消药品加成。

在本次医改方案中,最重要的内容便是,北京行政区域

内的全部3600余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平均15%的药品加成,此外包括CT、核磁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降低。北京市卫计委主任介绍,医药分开改革的目标,就是切断医院、医生靠开药赚钱的补偿模式,引导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,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诊疗服务,获得合理的补偿。换言之,让医生收入与所开药物、治疗实现脱钩,釜底抽薪治理过度医疗问题,让医疗工作者的劳动收入体现在明面上。

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,本次改革还新设置了医事服务项目,其目的是补偿医疗机构部分运行成本,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。开设医事服务费后,原挂号费和诊疗费取消。以三级医院为例,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50元,副主任医师60元,主任医师80元,知名专家100元,急诊医事服务

费70元,住院医事服务费100元/床日。其他诸如护理费、针灸费等服务价格明显低于劳动价值的项目,也有所增加。可以预见的是,此医改新政却掉了医患之间产生直接冲突的利益点,“感个冒开一包药”之类的不合理现象会逐渐消失。然而,也有专家认为,三大项医改新政全部到位后,患者总医疗费用虽有所下降,但综合降幅不会很大。

我国种种医疗领域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相对缺乏,且分布不平衡。此次北京医改新方案属于在调配资源上的举措,也即是说,为“节流”之举,并非“开源”。想要指望一次医改举动就能彻底消除“看病贵”“看病难”,并不现实。不过,医改之路正是由无数个创新性举措铺就的,虽然暂时还到不了终点,但可以相信,路是靠人们走出来的。



给校园装上“安全控件”

■盛玉雷

教治的同时,也需对校园安全进行检视与反思。

踩踏事故的发生,往往与人群失序有关。造成秩序失常的原因多种多样,但引起河南濮阳学生人群失序的原因,竟是集体上厕所的争分夺秒。这背后,是短短十分钟的考前间歇、逼仄狭窄的楼梯设计、不合理的厕所布局。据记者现场观察,全校1700多人共用四间厕所,其中女厕坑位只有24个。

教化之本,出于学校。这显然不是校园安全警钟的第一声长鸣,却依然让人们的心震不已。有研究报告显示,校园已成为少年儿童、青年学生最为安全的生活场所;但与此同时,另一份调查却表明,学校也正成为家长们最担心孩子受到伤

害的地方。这样的矛盾是因为,安全事故概率虽低,但对于当事人和家庭而言,每一起事故都是100%。近些年来,从食物中毒到校车事故,从校车车祸到校园欺凌,校园安全事故多次演变成社会公共事件,所积聚的焦虑亟待通过加强校园安全建设来有效纾解。

安者,非一日而安也;危者,非一日而危也,皆以积然。在生产领域有一个海恩法则,是说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,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。对校园安全而言同样如此。其实,无论是厕所还是校园的昏晃角落,不管是课堂还是课下对学生的每一句叮嘱,只有时刻控制好校园内外关系师生的每一个变

量,才能解好校园安全这道难题。这不仅需要教育部门切实的检查督导,更需要教学领域所有参与者不只停留在口头的自觉与重视。

往深层看,此次事故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校园安全问题,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教育资源分配课题。据悉,事发学校共有学生1704人、23个班级,这明显违反了教育部有关“城市完全小学最大规模不超过45人”的规定。这样的“超载”,在很多地方都存在。

教育资源的现实布局与实际需求不匹配,反映出当前不少地方教育实践的尴尬。教育部早就明确指出,“城区学校‘大班额’现象普遍”“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

读数量倍增,配套学校和教育设施未能实现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,基础教育供需矛盾日益突出”。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产生“马太效应”而聚拢大量学生,另一方面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,既留下了教育的难题,也埋下了安全的隐患。这说明,只有创造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供给,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,让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合理,才能让孩子们既享有教育的权利,也沐浴安全的阳光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孩子们成长得更好,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保证校园里的一方净土,让设施齐备的校园成为孩子成长的保护层,是实现这一心愿必不可少的“安全控件”。